

民俗

在适应与变迁中传承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文 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八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八集)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文化

民俗:在适应与变迁中传承

张春秀 刘目斌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在适应与变迁中传承/张春秀,刘目斌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8

(人类学·民族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

ISBN 978-7-81108-584-6

I. 在… II. ①张…②刘… III.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报告—中国 IV. K89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761 号

民俗:在适应与变迁中传承

作 者 张春秀 刘目斌

责任编辑 覃录辉

策划编辑 沙 平

装帧设计 张日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7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84-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

——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郝苏民

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在全中国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虽也有过一个运行时间很短的“研究室”，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新中国初期，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相关专业经过“院系调整”后迁到西北民院的蒙古、藏、维吾尔语文教学，整合为“语文系”，完全成为解决民族语文翻译急需的性质，而非民族学专业。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

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类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十年动乱”、“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和教育者们既是一个极大鼓舞，也确实促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一个认真反思：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所谓“红色政权”及其造反派们一举“砸碎”、撤销这所新中国首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时，其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肆意妄为，竟是那样地顺利得逞！曾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师生们为什么竟是毫无理性抗争，亦无正义反对？……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应该视为当时本院民族学人、教育工作者与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痛定思痛的一个学术心愿和忠诚民族教育的初步圆梦！

然而，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却能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大学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第一桶金后，便产生了连锁效应，吸引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们为之心动。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短缺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而此直接涉及到教师们工作量、课时、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一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那时我们却还在该不该调进某人、该谁来办某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念，在那时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进入所有负责人的指挥头脑。自然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十年动乱”已耗费多少年华，而之后，难道还要空待大好时机这般

流失？事到此时，方知为这等“文化大革命”须付历史代价之了得；方知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知识的缺失于民族高校的创办、经营关系的重要性何等至关！然而，必须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之患今后仍须渐次从各方一一在高校显出……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其时，一是全国先行者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一些领导认同，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几次整合的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了原本满怀希望的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2001年7月26—8月4日，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借教育部为北大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在西北重镇兰州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及西北民大合作举办了全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培养西北各民族此类专业的研究人才。费老亲临民大为我系揭牌，并在开幕式和研讨会作《民族生存与发展》、《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主题讲演和讨论中的“插话”；还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专题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 4 · 在适应与变迁中传承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7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34名学生，已毕业者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了文化部、科技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我们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

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丰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生的教学都在有序地进行和不断改进完善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如北大的马戎、王铭铭、邱泽奇，中央民大的杨圣敏、祁庆富，香港中大的陈志明，人大的郑杭生，辽大的乌丙安，南大的刘迎胜，北师大刘铁梁、董晓萍、万建中……），在大开局面中曲折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甚至东北、西南各地。

同时，在物质条件极其不足的状态下，我们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 CSSCI 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敬重名流爱新秀”，“学术面前皆平等”的一块公正平台。我刊帮助各高校不少素不相识的本专业硕、博士生成全他们学位论文的问世；我们也帮助不少高校本专业多无个人关系的教师为晋职而难以发表的论文及时刊出，为专业队伍的形成，尽了我們一份责任。

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感悟到：虽无理由更改已显成果

的途径，但此路子离幸得历届某些领导认同的事实，会常有不断的苦恼和艰辛！好在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探索，仍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性学术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辈代表人物费孝通、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一度誉为中国民俗学人才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到边陲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事实使我们欣然！

不久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地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管理。历来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均衡、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对学科去、存、“凝练”？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皆为专业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然而并非全是教育内行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大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不了多大决定性的作用？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各高校的个性、特性或优势发展，合力如何形成？是高校的主人们来认同、推动，抑或是高校领导集团或一把手来运动高校群众？一时还看不清楚。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本人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文化的大范围，但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实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有可能抓学科建设的专

业内行领导人，对它了解或是否感兴趣会成为它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吧……

当然，杞人忧天也大可不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真理名言，还是无可置疑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本界所认同过；“有无必要”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万机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生活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心同此理吧！

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衔、领导们的结合而春风满面，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社会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了。

本系列之一，曾为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之三、之四共三集经本学院文化（苏依拉）博士努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由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

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

现在为系列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共四集由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士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君子们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做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代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理解、呵护、支持、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同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诸位了！

除已经鸣谢者之外，他们还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毛公宁、马麒麟、谢玉杰、金雅声、杨圣敏、马戎、王铭铭、祁庆富、覃录辉、沙平、马国柱、僧格、文化等诸位先生；此外，满珂、马忠才、王淑婕、那贞婷、曹玉杰、刘秋芝、王淑英、佟格勒格等硕、博士同学们。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5 年 12 月岁末
2007 年元月修订

* 注：此篇是作者为《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所写的序言

目 录

系列总序	郝苏民(1)
羌族社会的人生礼仪研究	
——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个案	马宁(1)
拉萨市穆斯林的生活习俗现状调查	张春秀(82)
河湟筏子客生活世界的民俗内涵	刘目斌(120)
兰州市“东乡村”民俗生活适应与变迁的调查	白晓荣(182)

羌族社会的人生礼仪研究 ——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个案

马 宁

一、导 言

1. 缘起

我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汉藏结合地区的羌族人,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对汉、藏文化非常熟悉,对于本民族文化反而疏远了。为了能融入以汉、藏文化为主的主流社会,我一直在试图抹去自己身上的民族烙印,尽量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族别是一个障碍,它限制了我向主流社会靠拢的进程。通过在西北民族大学三年的民俗专业的学习,使我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真正感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快感,那些在我原先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顿时变得鲜活起来,于是,我就绞尽脑汁地回忆小时候所接受的民俗养成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我对羌族的每一项民俗事项都烂熟于心。在这种背景下,我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定位在羌族的人生礼仪上,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来完成它。

从20世纪初到现在,研究羌族的文章和专著不少,但是能以民俗学的眼光来审视羌族民俗的却很少,一般都是对民俗事项的单纯描写而缺少理论探讨。现在我国对羌族的研究正处于低谷,据我调查,只有一个民间的“羌学学会”在支撑,但又往往由于经费不足而裹足不前。在这种前提下,我想有必要对本民族做出一点贡献。我之所以选择了羌族人生礼仪做文章,是因为就目前来说,学术界关于羌族人生礼仪进行系统论述的著述不多,即使有,也已

经时过境迁了,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羌族人生礼仪也已经变化了。我想通过对羌族人生礼仪的研究来体现这种变化,运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知识,对羌族人生礼仪的发展、变迁及其在羌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作用做出较深入的研究,以期得到一点对羌族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有意义的结果。

2. 羌族人生礼仪研究的意义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总人口为 30.61 万人。羌族的居住地较集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省的石阡县、江口县。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羌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人生礼仪就是最能体现羌族民族特色的民俗事象。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羌族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很多重要的民俗元素正在被现代文明所吞噬,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羌族现阶段的人生礼仪就显得格外重要。“人生礼仪是随着个人人生不可逆时间的各个阶段顺序举行的连续性礼仪,它建立在个体的生理状况以及社会差异和变化、民俗信仰、社会信念等多重基础之上,具有调控社会平衡、保障个人社会适应并促使其文化变化等方面的功能,普遍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之中。”^①笔者通过对羌族人生礼仪的“深描”,将目前羌族人生礼仪的真实现状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人们深入了解羌族人生礼仪,进而了解羌族传统文化作出贡献,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羌族的研究多偏重于专题性研究,而缺少综合性研究,其中对羌族人生礼仪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本文中力图对羌族人生礼仪进

^① 乔继堂:《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3,第1版,第15页。

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提出羌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的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二、文献综述

1. 文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网络资料,查到 1990—2004 年之间有关“羌族”的研究和译介论文以及与人生礼仪、社会关系、社会功能有关的论文 190 篇,内容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学科。

②收集到关于“羌族”的研究专著 46 本。

③查阅多种地方志和相关地方档案。

2. 文献述评

我国对羌族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鉴民、马长寿、任乃强、庄学本等人开羌族研究之先河,奠定了我国羌族研究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多是历史、地理、文学性的研究,胡鉴民的《羌族的信仰与习为》(1941)成为后人研究羌族时引用的权威著作,一时无人能出其右。马长寿的遗著《氐与羌》(1984)、任乃强的《羌族源流探索》(1984)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羌族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庄学本的《羌戎考察记》(1937)则是一部散文体的游记。在此前后,国外学者也对羌族进行了研究,如:英国的托马斯·托伦斯牧师(Thomas·Torrance)于 1920 年著有《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一书;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于 1944 年撰写了《羌族地区的考古发现》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Chiang Region 一文。他们的研究被当地羌族知识分子戏称为“隔靴搔痒”,成就不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又掀起了一股羌族研究的高潮,例如: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编写的《羌族史》(1985),四川省编写组编写的

《羌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羌族简史》(1986),钱安靖编写的《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羌族卷》(1993)都是羌族研究方面重量级的著作,何光岳在任乃强的《羌族源流探索》一书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写成了《氏羌源流史》(2000)一书。从此之后,我国的羌族研究又进入了一个低迷期。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羌族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除国内学者的执著研究外,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古贺、工藤元男等学者的研究也颇有成绩。但是他们的研究对羌族的人生礼仪涉及不多,即使有也只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这点对于没有在羌族地区生活过、对羌族文化不甚了解的他们来说,是不能强求的。我国年轻学者中在羌族研究中做得较好的的是在四川省汶川县长大的社会学博士徐平,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羌村社会——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与变迁》中第一次对羌族人一生中所经过的人生礼仪作了详尽、客观的论述,可以说填补了我国羌族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他的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但是在笔者对当地羌族知识分子进行采访时,他们却对徐平的研究给予了驳斥,并说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可以说他的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却没有使羌族人民信服。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对羌族的人生礼仪进行再研究,尽可能地写出让学术界和本民族人民都认可的文章。

三、与信仰有关的羌族人生礼仪

“人生仪礼是指人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①在羌族人的一生中,虽然礼仪很多,但是主要的人生礼仪有出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笔者在该研究中所涉及的人生礼仪主要以上面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第1版,第157页。

所说的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为论述对象,这些丰富多彩的礼仪既有社会特征,又有信仰特征,是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侧面。羌族的人生礼仪在社会的发展中代代相传,又在传承和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得到发展。在国家强有力的现行政策的规范下,羌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逐步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受“万物有灵论”原始宗教影响很深的羌族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羌族人一生中必须经过的人生礼仪上就是:出生礼的衰微,成年礼和婚礼的合并,婚礼和葬礼的极度膨胀。“民俗民间文化的嬗变,一般是在一种‘层垒式’的积淀中产生又变异,变异又新生的。我们所谈论和捕捉到的民俗事象,只不过是一定时空下的具体的民俗民间文化,而不是恒态的,不变的民俗民间文化。”^①所以,笔者在做本研究时,分别选取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羌族人生礼仪的情况进行比较,力图找出羌族人生礼仪发展的真实脉络。

(一)羌族出生礼研究

“一个婴儿刚一出生,还仅仅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为他举行的诞生仪礼,他才获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②羌族是一个小民族,一直处于外界强势文化的包围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长期以来,在民族性上就表现出了世故、灵活、善变和忠实的性格。由于他们要生存,所以就很重视人口的繁衍,由于战争是需要男性来充当主要力量的,所以又表现为重视男孩的出生而轻视女孩的生育取向,这是为适应古代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以前羌族的生育习俗很繁琐,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

①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11第1版,第135页。

②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第1版,第158页。